

韩愈原本文对传统正名思想的接受

许珂新* · 安赞淳**

<目次>

- | | |
|-------------|----------------|
| I. 序言 | 2. 韩愈的原本文 |
| II. 韩愈原本文考辨 | III. 传统正名思想的接受 |
| 1. 何谓‘原本文’? | IV. 结语 |

I. 序言

韩愈是中唐时代杰出的散文家、诗人，他的一生留存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在唐代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现如今留存下来的韩愈散文大约有355篇，形式多样，内容庞大，其中，论说文在韩愈的散文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类散文紧密结合社会现实问题，或谈政治，或谈哲理，或谈文学，都能做到切中事实，他的论说文在各个文体上都创作出了优秀的范本。其中论说文〈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是韩愈文集中创作的一系列以‘原’字命题的文章。关于这五篇文章的创作，一般被认定为创作于韩愈被贬谪阳山的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前后¹⁾，因为此时他的思想与文风都正处于成熟确立的阶段。从文学方面看，这五篇文章流

* 庆北大学校 中文系 博士生：第一著者

** 庆北大学校 中文系 教授：通信著者

1) 刘真伦, 〈五‘原’的创作与道统的确立——兼论韩愈阳山之贬与文风之变〉,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 2006.

露出浓厚的文以明道的文学倾向，对研究韩愈的文学主张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思想方面看，这五篇文章的道统理论、心性本体理论还有鬼神观等理论明显展现了韩愈以儒家思想为本位的思想主张，对于研究韩愈的思想主张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概括这五篇文章的基本内容可知，〈原道〉可视为这五篇文章的总论，其余四篇则可以看作是〈原道〉的补充存在，〈原性〉把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重新定义为人类德性的基础，又将‘仁’规定为人类的本质属性来彰显博爱的精神，并定‘性’为天命之理；〈原人〉在与天、地的相互关系的论证中确立人是万物主导的事实，依托《周易》的‘三才说’，提出：“圣人一视而同仁，笃近而举远。”²⁾的观点以借此引发人们对‘仁爱’本质的深度思考；〈原毁〉指出毁谤的本原在于怠和忌；〈原鬼〉则体现了韩愈试图通过对儒家鬼神观的树立来矫正当时民间的怪力乱神学说，去除迷信风气的期望。

一直以来，学界对于韩愈原本文的研究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五篇文章的创作年代考证以及与其道统理论的关系论证，如刘真伦〈五‘原’的创作与道统的确立——兼论韩愈阳山之贬与文风之变〉³⁾、张清华〈韩愈的道、道统及‘五原’的写作时间辨析〉⁴⁾、潘培鸿，张佩〈‘五原’中的破与立——论韩愈的护‘道’逻辑〉⁵⁾，还有思想内涵的阐释，如贾瑞芬〈韩愈尊儒思想探微——以‘五原’为例〉⁶⁾、张冬冬，高明雪〈韩愈‘五原’思想旨归论辩〉⁷⁾等方面，更有许多单篇文章的道统理论以及人性论的分析，不再一一赘述。以现在可以考察到的资料为基础，从文体的角度出发探讨原本文的文章少之又少，其中刘宁〈韩愈‘五

2) 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8页。

3) 同注释1。

4) 张清华，〈韩愈的道、道统及‘五原’的写作时间辨析〉，《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

5) 潘培鸿·张佩，〈‘五原’中的破与立——论韩愈的护‘道’逻辑〉，《名作欣赏》，2015。

6) 贾瑞芬，〈韩愈尊儒思想探微——以‘五原’为例〉，《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9。

7) 张冬冬·高明雪，〈韩愈‘五原’思想旨归论辩〉，《商洛学院学报》，2012。

原’文体创新的思想意涵》⁸⁾一篇文章以‘原本文’由韩愈创造为先行条件,详细阐述了唐代以前历代儒学思想家对正名思想的利用和改造以及正名思想在韩愈原本文的思想意涵阐释过程中起到的奠基作用,而本文将重点放在原本文的文体起源考证、韩愈的原本文文学特色、文体拓展历程及其对正名思想在逻辑层面接受与创新等维度,从更加多元的角度出发揭示原本文这一文体作为一种独特的论说方式对后世文学与思想的影响。

II. 韩愈原本文考辨

1. 何谓‘原本文’?

原字,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

‘水本也,从泉出厂下。愚袁切。’〈月令〉‘百源’注曰:‘众水始所出为百源。’⁹⁾

可知‘原’字的本意即为探究、溯源与求其本根之义,但正如刘宁在〈韩愈‘五原’文体创新的思想意涵〉中论证的那样,韩愈原本文中所谓之‘原’,不是为了考古,而是通过溯本追源的方式推论事物的本原,用最初的意义论证指出概念在现实中存在的偏差从而使问题得到纠正,溯源只是手段,目的是对现实的分析 and 评论,原本文以‘道’、‘性’、‘毁’、‘人’、‘鬼’这五个概念为探讨的对象,使它们在当时社会中产生的偏离儒家传统思想价值体系的部分重新回到正统。以‘毁’为例,中唐时期文士之间的争名毁谤成为一种风气,不光韩愈本人遭各种谗言缠身:“愈不幸独有接后辈名:名之所存,谤之所归也。”¹⁰⁾韩愈看中的人才也饱受困扰,李贺便因争名毁谤者过度畅言避讳使他断送了进士考试的道路,韩愈不仅在其作品中曾经多次提到其事,还针对此事曾专门

8) 刘宁,〈韩愈‘五原’文体创新的思想意涵〉,《安徽大学学报》,第四期,2018。

9)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册(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003页。

10) 同注释2,231页。

作〈讳辩〉一文进行驳斥，〈原毁〉一文也是为了制止和消除毁谤之风为目的而对毁谤风气的源头进行追溯而作，企图从根源上了解‘毁谤’然后教诲文人矫正不正之风。借助〈原毁〉韩愈阐释了毁谤的本原在于怠与忌，自己不努力是为‘怠’，但是又怕别人超过自己是为‘忌’，并通过具体的事例将世情薄态进行了立体剖析，最后道出士人处世之艰的主旨。

关于原体文的出处，北宋石介称：“吏部〈原道〉、〈原人〉等作，诸子以来未有也。”¹¹⁾可知北宋时期就有原体文起源于韩愈的说法。明代的文人吴讷在《文章辨体序说》提出：

若文体谓之‘原’者，先儒谓始于退之之五原。¹²⁾

一百五十年后徐师曾继承了他的观点：

按字书云：‘原者，本也，谓推论其本原也。’自唐韩愈作‘五原’，而后人因之，虽非古体，然其溯原于本始，致用于当今，则诚有不可少者至其曲折抑扬，亦与论说相为表里，无甚异也。¹³⁾

根据吴讷与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可知，明代时原体文已经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被注意并且发扬成为了一种论说文体形式，这种文体立题定体始于韩愈几成定论。到了清末民初，古文大家吴曾祺也曾经提及：“原者，溯其始之谓也。古无此体，韩退之始作〈五原〉，后人因仿而为之”¹⁴⁾。然而到了近当代，原体文的出处有了新的争论，学者吴承学认为：“因篇而得名是中国古代文体命名方式之一，不少唐宋以来盛行的新论说类文体是因为韩愈、柳宗元的名篇而得名的，唐宋以前没有原这种文体，原体的

11) 吴讷·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44页。

12) 同上，44页。

13) 同上，132页。

14) 王水照，《历代文话》(第七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6675页。

出现是因为韩愈写的‘五原’……解体也明显是因为韩愈的文章而立体的。”¹⁵⁾另一位学者程志华则进一步将原文文的源头追溯到比先秦时期更早的战国末：“《吕氏春秋》有《原乱》篇，对‘乱’进行穷本究原，从而开创了‘原xx’这种文体。”¹⁶⁾又有学者章必功提出应该视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主持编撰的《淮南子》中的《原道训》一文视为后来原文文的开端。也就是说根据现在可以掌握的资料向唐朝以前的文章追溯，还有至少三篇以‘原’字命题的文章，除《淮南子》卷一有《原道训》，《吕氏春秋》中有一篇以《原乱》命名的文章之外，还有刘勰《文心雕龙》中一篇以《原道》命名的篇章存在。众所周知，刘勰的《原道》是文学理论著作，以骈文写成，其论证方式带有明显的说理性质。《淮南子·原道训》是以道家思想为核心的古代哲学论说文，全文围绕‘道是什么’和‘如何体道行道’展开，具有鲜明的理论建构意图，旨在说服读者接受其道家宇宙观与政治观，既有抽象推演，用寓言、史实作为论据，加之以系统化的论证结构，非常符合论说文的基本范式。《吕氏春秋》中的《原乱》通过系统的逻辑论证、历史例证和理论分析探讨了社会动‘乱’的根源及其治理之道，明确的论说目的，严密的论证结构，多元的论证方法体现了它是一篇结构工整的典型的论说文。然而，这几篇文章虽也都是以‘原’字命名，但这里的‘原’，并没有像韩愈的‘五原’一样展现出强烈的儒家道统的教化典范作用，仅为溯源解释之意，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后世原文文有所不同，因此并没有被明代学者纳入原文文的轨范。因此，从议论文文体角度看，原文文这种独特的说理文体形式传至后世追随效仿者众多，确实是自韩愈而起，但单纯地以为原文文是由韩愈首创的说法却是不甚客观考虑到史实的。

2. 韩愈的原文文

论辩文是以辨明是非曲直，阐发义理为宗旨的论述型文章，文风多重思

15) 吴承学,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1, 323-324页。

16) 程志华, 《中国哲学‘原人’问题的学术史考察》, 《光明日报》, 2022(6月13日15版)。

辨与辩驳之势，往往以推理缜密、论证曲折见长。韩愈向来崇尚孟子，人们论及韩愈之论辩，也多认为其文章技艺渊源于孟子，孟子的议论以充沛的气势而著称，即‘善养气’，但孟子自己说过：

波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之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¹⁷⁾

可知在议论中，孟子也一样标举对辩证群言的关注，即‘知言’。然而韩愈在原文中的论证并不仅是对客观事物道理是非同异的反映，更多的是以塑造价值标准来达到伦理教化的主观目的，因此其辩难议论的内容比起一般论辩文是有所简化的。与孟子的论辩相比，原文的议论侧重树立自己的观点，在评论一种事理或者现象时，不从现状开始剖析，也很少辨析其他观点，而是直观地从产生根源和历史状况的方面推原事物的本义，从中找出症结并且指陈利害得失，从气势上看原文似乎更加注重‘养气’。李翱作为韩门弟子，〈答朱载言书〉中言及说理文需具备的写作技巧时说到：

理辨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¹⁸⁾

“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¹⁹⁾观察韩愈五篇原文的开头和结尾可以发现，通常都是开篇起势，首先以古今对比的方式，抛出一个前人固有的论断或道理占据全篇文章的主导地位，不同于解释该论断的出处以及如何印证，反而以该论点为前提展开文章的后续，将自己的道理置于优势地位，将对方带入自己的逻辑，顺着他的观念去思考问题：

17) 朱熹，〈孟子集注·公孙丑上〉，〈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216页。

18) 李翱，〈李文公集·答朱载言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29页。

19) 同注释2，17页。

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²⁰⁾

紧接着以庞然的气势抛出自己的论断，仿佛不曾给人留有置喙的余地：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²¹⁾

除了强大的气势外，权威的语气，畅通的辞藻，都使其文章具有义正辞言的说服力，让人难以辩驳。〈原道〉中韩愈论儒家之道的方式，便是直接对其内涵进行说明，其后并不对其‘道’的内涵作更加具体的阐述，而是趁其之‘道’的势批判佛、道之道，让人觉得不容辩驳，结尾部分更加以“不塞不流，不止不行。”²²⁾的自信果断深化文意，振奋精神，使得文意尤其充足。在行文体制上，不同于当时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的其他论说文(辨、议、论、说等)，〈原道〉选择采用散体单行的形式，章法上错落有致，自由变化，看似随意，实则富有内在的韵律和节奏：

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瞻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²³⁾

韩愈以十分具有感染力的文法一气呵成地将尧舜圣人指导下百姓生活井井有条的全貌陈列出来，增加了读者对其“如古之无圣人，人类之灭久矣。”²⁴⁾

20) 同上。

21) 同上。

22) 同上，20页。

23) 同上，17页。

24) 同上。

这一观点的认同感。在原体文的说理过程中韩愈还以事例系列组合的方式说明道理，佐证观点，以〈原鬼〉为例：

有啸于梁，从而烛之，无见也，斯鬼乎？曰：非也，鬼无声。有立于堂，从而视之，无见也，斯鬼乎？曰：非也，鬼无形。有触吾躬，从而执之，无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无声与形，安有气？²⁵⁾

这里可以看到韩愈以通过连续举例铺排叙事来巩固立论，再加上结构相同或相似，意义相关，语气一致地排列，在强化文章的说理气势的同时更是提升了论说文的艺术气质，让人有焕然一新的感觉。

不过，虽然在文体形式上原体文(尤其是〈原道〉)体现出了强烈的创新与开拓精神，可能受骈文复盛，古文衰微的影响，中晚唐时期以及五代十国时期，原体文并未受到一般士人群体的重视。现在可以考证到的晚唐时期的原体文有皮日休《皮子文藪》中的十篇以原字命名的文章，分别为〈原化〉、〈原宝〉、〈原亲〉、〈原己〉、〈原弈〉、〈原用〉、〈原刑〉、〈原谤〉、〈原兵〉、〈原祭〉，皮日休将其总称为‘十原系述’，并于行文前题之曰：

夫原者，何也？原其所自始也。穷大圣之始性，根古人之终义，其在十原乎？呜呼！谁能穷理尽性，通幽洞微。为吾补三墳之逸篇，修五典之堕策，重为圣人之一经者哉？否则，吾于文，尚有歉然者乎？²⁶⁾

皮日休试图以给这十篇文章用‘原’字命名的方式来强调其穷理尽性，弥补经书不足目的，其中第一篇文章〈原化〉中，皮日休提到：“如是为士，则孰有孟子哉？千世之后，独有一昌黎先生，露臂瞋视，诟之于千百人内。其言虽行，其道不胜。苟轩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则吾以为孟子矣。”²⁷⁾可见，

25) 同上，29页。

26) 皮日休 著·，萧涤非·郑庆笃 整理，《皮子文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21页。

27) 同上，22页。

‘十原系述’正是继承了韩愈企图从根本上起到教化之目的的文章。

北宋开国后，士人群体为了排斥所谓的异端邪说掀起了‘尊韩’的思潮，随着文人学士对韩愈文章的日渐推崇，韩愈文集流行于世，原文文的重要性也开始被认可，当时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在庆历年间的作品〈本论〉一文就是模仿〈原道〉而作。宋仁宗嘉祐五年《新唐书》修成之后，〈韩愈传〉对〈原道〉、〈原性〉等文产生了极高的评鉴：“其〈原道〉〈原性〉〈师说〉等数十篇，皆奥衍闳深，与孟轲、扬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经云。”²⁸⁾根据后世可以考察到的文学资料，学者刘成国曾经统计出当时至少有：孙冲〈原理〉、贾同〈原古〉、尹洙〈原刑〉、石介〈原乱〉、欧阳修〈原弊〉、〈原正统论〉、释契嵩〈原教〉、〈广原教〉、〈原孝〉、〈论原〉、张方平〈原蠹〉、李觏〈孝原〉、〈原文〉、〈原正〉、胡瑗〈原礼〉、蔡襄〈原赏〉、司马光〈原命〉(佚)、王安石〈原性〉、〈原教〉、〈原过〉、潘兴嗣〈原谏〉、孙洙〈明堂原〉、〈封禅原上〉、李清臣〈法原〉、〈势原〉²⁹⁾等等几十篇原文文的写成。通过多名文人和理学家参与过的原文文写作，可以看到原文文作为一种新的论说文体在北宋时期逐渐定型并得到广泛推广的历程。

宋廷南渡之后，理学日渐兴盛，南宋时期科举考试作为士人阶层流动的主要途径，竞争异常激烈。为了推动思潮转换士人纷纷通过注释，序跋，史评，语录，笔记，书信等各类书写方式称扬、批评、模仿、借鉴文学经典，‘以古文为时文’的观念成为主流，学习韩愈的文章成为了当时各界文人的共识，加上印刷技术的提高，科举参考用书大量出版，以〈原道〉为首的原文文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普及。南宋的重要古文选本如《古文关键》、《文章轨范》、《古文集成》、《崇古文诀》等都有韩愈原文文的选入，这些选本对原文文进行用字、句法、结构的剖析，把其中的构思以及创新条分缕析，整理为成写作的常识和技巧进行学习。吕祖谦的《古文关键》作为现存最早的古文评点选本，素有‘评点第一书’的称号，其卷三选入〈原道〉，对其行文的

28) 宋祁等撰，《新唐书》卷一七六，北京：中华书局，1975，5265页。

29) 刘成国，〈文以明道：韩愈‘原道’的经典化历程〉，《文史哲》第3期，2019，47页。

形式与技巧进行了点评，谢枋得的《文章轨范》则着眼于提炼〈原道〉文体上的工夫技巧，对其句法变化、句式美感进行了点评，例如对“为之君，为之师”一段，批评道：“此一段连下十七个‘为之’字，变化九样句法，起伏顿挫，如层峰叠峦，如警涛巨浪，读者快新畅意，不觉其下字之重叠，此章法也。”³⁰⁾宋神宗之后，科举考试更加重视考生的策、论能力，在类书以及时文选本如魏天应选编、林子长笺解的《论学绳尺》作为当时流传最广的科场参考书，随处可见原本文的身影。借助科场文化的推动，原本文的形式和技巧一度成为士人学子古文写作的圭臬，这种现象金元时期也一直在延续，金源后期的儒林领袖赵秉文在《滏水集》以〈原教〉为压卷首作，是现存金代文学作品中唯一可见的原本文作品。元朝时期以郝经为首的一些理学家也有模仿韩愈原本文的创作，如胡祗遹撰〈原心〉、〈原教〉、吴澄撰〈原理〉、吴师道撰〈原士〉等，这些都使原本文文体的成熟得到了推进与完善。

III. 传统正名思想的接受

荀子作为儒家正名思想的集大成者，在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下，他系统的探讨了正名的思想过程，其中“儒家认为名的使用应当包括道德上的判断作用，这个观点，被荀子保留在自己的理论中，即名的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判明贵贱。”³¹⁾西汉时，为了达到君权至上的目的，‘正名’演变为了美化君权的理论工具，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杂糅阴阳学说，将荀子提出的君臣、父子、夫妇的角色规范为教条式的三纲之论，明确三者之间下位者对于上位者的归属感，并将正名思想与天命论无缝结合来对概念进行定义。对于‘性’这一概念的解释，董仲舒的说法是：

30) 谢枋得，《叠山先生批点文章轨范》中华再造善本卷四，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3页。

31) 胡适，《先秦名学史》，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134页。

圣人之心不可以名性，斗筭之心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心。…
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³²⁾

首先他继承孟子的观点，肯定了人具有‘善’这一品性，但董仲舒认为的善‘质’与善‘性’在概念上、本质上有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筭之性的差别，他通过论述‘性分等级’与‘善端非善’的方式来强调后天教化对人性影响的重要性，对此学者刘宁评价道：“对‘性’区分品级的差别化认识，是董仲舒运用正名的逻辑和方法认识人性的直接产物”³³⁾。

韩愈继承了前人如董仲舒、王充等人借助品级区分本质的方法，在概念定义上有了进一步的创新，同样是‘性’，韩愈在〈原性〉中给出的定义演变成：“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性者五。”³⁴⁾他明确以仁、义、理、智、信五种德行来确立人性的基本构成，‘性’分三品，所谓的上品之性，其关系是‘主于一而行于四’³⁵⁾，分出主次，规定义、礼、知、信不再并列于‘仁’，而是从属于‘仁’，作为博爱之‘性’的仁被升华为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本质属性，而其中上品之性则被韩愈强调为性‘善’(也就是仁)的主导性；中品之性是因为仁或多或少，不够坚定，五种德性也是混淆的状态；下品之性则是对这五种德性的完全违背。虽然在思想上韩愈也继承的是孟子的性善说，但是他在原本的学说上又进一步深化了‘性善’的内涵，明确用儒家伦理规定人性的本质，并以德性的多寡、有无来界定概念，这种论证方式在后来受到了朱熹的称赞：“退之见道处，却甚峻绝。性分三品……退之说性，只将仁、义、理、智来说，便是识见高处。”³⁶⁾朱熹是理学大家，他对韩愈心性哲学的称赞，可以说从侧面表示了对韩愈开“宋明新儒家之先河”³⁷⁾这一说法的认同，

32) 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284页。

33) 同注释8。

34) 同注释2，22页。

35) 同上。

36) 黎靖德等编，《朱子语类》第八册，中华书局，2020，1365页。

37) 冯友兰，《韩愈李翱在中国哲学史中之地位》，《清华周刊》，37卷9-10期，1932年5月7日，3页。

而这也可看作对韩愈运用正名思想取得效果的一种肯定。

〈原道〉以‘仁义’为‘道德’的定义，使‘道’获得了明确的本质上的界定，并以确立儒为正道，其余为旁道的高下判别之法建立儒家话语的合法性；〈原性〉认为‘性’之本义为‘天命之理’，并以给‘性’分品级的方式对仁、义、礼、智、信五种德性的高低远近进行区分；〈原人〉以‘人’之本义为天地之中枢，能行仁义、体天之德，并将‘仁义’之人与禽兽进行区别，将人置于高位；〈原鬼〉使‘鬼’名有所本，将之解释为“气之归”，通过‘气化实有’恢复鬼的自然与伦理功能，而佛老或说‘无鬼’，或说将鬼‘化道’这些都于中道有所偏离；〈原毁〉解释‘毁’之本义出于理性之恶，并且区分了正当批评与非理中伤的差别，将毁分为正毁与邪毁，以“毁当以理裁”判定是非。可以看出韩愈这五篇文章在论述观点时每一篇都注重论说对象本质的同时强调它们与歧义邪说之间的高下之分，如刘宁所言，“这种从根本上对概念进行‘别同异’与‘明贵贱’的方式体现了韩愈对正名思想的深入继承与灵活运用”³⁸⁾。

要追究韩愈在原体文中选择继承与运用正名思想矫正儒家价值观念产生偏差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孔子，因为根据现有史料表明，先秦时期儒家代表人物中最早对‘名’的内涵进行反思的人就是孔子。面对周室大权旁落，礼乐崩坏春秋乱世，孔子期望通过‘正名’实现‘正政’，推行儒家伦理政治。关于孔子有关‘正名’的最直观的经典论述如下：

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³⁹⁾

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⁴⁰⁾

38) 同注释8。

39) 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521页。

40) 同上，483页。

正名在孔子的思想价值系统中，落脚于对社会德目系统的正本清源，作为价值重建的进路，正名思想应德性恢复的要求在礼乐系统中以批判的方式承担了人伦价值重构时厘清德性内涵的作用。比如，孔子对“言不顾行，行不顾言”的鲁之狂士表现出特别的赞赏，却对常被流俗称道的‘乡愿’者恶之特深且辟之尤亟。《论语》中有几则可看作与乡愿有关：

子曰：“乡愿，德之贼也。”⁴¹⁾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⁴²⁾

愿者，谨善之谓也，孔子却称乡愿为‘德之贼’是因为乡愿缺乏内在的道德价值准则，以逢迎流俗社会的方式来沽名钓誉。换句话说就是大盗巨蠹对社会秩序造成危害固然应该为世人所不齿，但是乡愿者看起来以忠信自居，以廉洁行事，表面上道貌岸然，细看就会发现那些只不过是似是而非假装出来的样子，这样的人存于世上会混淆世俗真正的是非善恶，隳坏考量社会价值的尺度，对社会整体的危害性往往为恶更甚，因此孔子提出“恶乡原，恐其乱德也”的观点。对貌似善德者的严正破斥，表现了孔子正本清源，为了让‘君子’之实质重新回归道德人伦秩序的努力，这也是孔子坚持常施正名原则的原因。

韩愈的原文也是通过追问‘名之所从出’的方法，在‘名不正’的时代恢复名之正，‘原’就是其正名的实践过程。唐朝自安史之乱激变之后，国运急转直下，盛唐时期的兴象玲珑不复存在，转为表面一派河清海晏，但活力欠缺的萎靡状态。为了修复战乱带来的创伤，佛老教义在此时发挥了疗愈伤痛抚慰人心的作用，顺理成章的大行其道，在长时间的风靡之下渐渐形成了儒、道、佛三家鼎立之势。由于在很多方面都与儒家立足尘世，上下求索的进取

41) 同上，673页。

42) 同上，546页。

精神背道而驰，佛道的盛行使传统儒家思想的稳定性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恐长期发展下去不利于国家统治。韩愈站在先秦诸子儒家学说的立场上重新建构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传承体系，〈原道〉言：“（佛道）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⁴³⁾佛老之思想主要为心性哲学，韩愈出道统说的目的在于辟佛老，因此他也将儒家之道内化成心性之学，采取揭示儒道与佛、老之道根本性差异的策略，以儒道中的‘仁、义’作为核心观念，先入为主的将佛、老思想贬斥为‘异端’，随即站在上位者的立场上指责佛老幸运的是出现在三代之后，所以没有被夏禹、商汤等贬斥，又说不幸的是没能出现在三代以前，不能受到先辈的教诲，在既‘幸’又‘不幸’，既‘不见黜’又‘不见正’的翻说中确定了儒家之道的合理性，自此将儒家之道夯实在正统地位，坐实渊源有自与统绪分明。

《说文解字》训‘名’字为：“名，字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可见，故以口自名。”⁴⁴⁾从造字本义上看，‘名’意在黑夜中看不见的人通过借助声音来互通名号，因此从根本上来看‘名’字就具有称谓事物和交流思想的功能，因此‘名’字本身就具有表明解释的涵义。先秦时期，正名思想包含了诸家对现实、社会和人生问题的看法，‘名’同时有语言、思辨、政治、伦理等等各种不同层面的内涵指向，所谓‘正名’是诸子用别同异、辨是非、明贵贱、审治乱的追索方式从不同视角考察‘物名’、‘名分’、‘名位’、‘刑名’等与名相关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名家学派向来‘专决于名’，公孙龙作为其中一名重要代表人物，《名实论》是他阐释自己名辩思想的著作，在这本书中，‘正名’二字的涵义得到了较为明确的内涵解释：

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位也。出其所位，非位。位其所位焉，正也。…其正者，正其所实也。正其所实者，其名正也。⁴⁵⁾

43) 同注释2, 18页。

44) 同注释9, 56页。

公孙龙对‘正’、‘位’等诸多概念进行了阐发，指出‘物’指天地之间的一切具体事物，‘实’指事物或对象的本质属性，‘位’指由事物的本质所规定的位置及界限，保持在事物本质界限之内叫做‘正位’，所谓‘正名’的实质就是纠正名的本质属性使其不超过原有的界限，‘正其所实’即使事物的名与事物的本质属性相表里，这是正名的内涵；‘位其所位’即使事物保持原本属性的位置和界限，这是正名的外延，如果事物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其位不偏离，那么就可以得到‘正名’的结果。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来看，正名思想脱胎于先秦时期社会伦理问题的辩论，应用性使其比起纯理论逻辑而言，更加容易成为诸家阐述社会政治理想、哲学伦理思想的思维工具，在韩愈的文章中，既有像〈师说〉一样开篇即言：“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这样的以‘说’的形式为‘师’正名，也有以‘原’字命题阐述观点的论述形式为‘道’、‘性’、‘毁’、‘仁’、‘鬼’正名，而这样对‘正名’本义内涵的追溯或许可以解释正名思想作为一种论证手段为韩愈塑造自己的儒家道统思想所使用的必要性。

“从逻辑的角度来看，正名在于明确概念。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方式，而定义是通过规定概念的内涵而使概念明确的一个基本方法。”⁴⁶⁾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概念与定义系统从先秦时期以来几乎一直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即缺乏对于事物本质属性认识的思维方式。这是因为比起纯理论逻辑而言，先秦时期的各位思想家更加看重正名思想作为阐述社会政治理想、哲学伦理思想的思维工具的应用性，比起研究对象的本质特征研究也更加重视对研究对象的判断、推理等实质性的研究，因此“概念的模糊性和不精确性，常被看作是中国哲学逻辑上的一个重要特点。”⁴⁷⁾这种自发地状态导致‘正名’思想对于研究对象的定义形式欠缺命题与抽象关系的推演过程，所以先秦哲人的辞(命题)，说(推理)，辩(论证)等文体并没有严格的系统特征。

孔子的思想有鲜明的伦理教化特征，但在许多道德和思想概念上的界定

45) 王琯, 《公孙龙子悬解四·通变论 第四》,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57-58页。

46) 邵强进, 〈论先秦正名思想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 《江海学刊》, 2004, 209页。

47) 同上。

上，孔子并没有做出进一步的本质说明，对这一点的困惑从孔子弟子子贡的语录中就已经初见端倪：

夫子之文章，可得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⁴⁸⁾

孔夫子讲授的诗书礼乐等典籍学问内容明确，学生可以听闻学习；但是夫子所谈论的人性本质与宇宙规律因为玄妙难解，就需要学生自己体悟了。例如面对弟子对作为人的本性的‘仁’这一概念的请教时，孔子几乎每次给出的答案都不一样：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矣。”⁴⁹⁾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宝，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⁵⁰⁾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⁵¹⁾

在孔子的回答下，针对不同的对象，有时‘仁’代表哲学上的概念，有时又代表心理学上的概念，还有时代表伦理上的概念，有对人之‘仁’，也有对己之‘仁’，还有对民之‘仁’。‘仁’变成了功能性的词语，从不同的角度解释均能成为一家之言，这就导致整部论语中‘仁’出现次数多达上百，但是具体的‘仁’是什么跟随当时的语境的变化可以有很多种含义，解释宽泛并且多变，随着时间的变化更是见仁见智，不同的人对‘仁’的解说有不同的可能，以至于此后两千多年没有人能够将孔子之‘仁’透彻的解析。

通过五篇〈原〉体文章的思想结构也可以看到，韩愈试图在正‘道’、正‘

48) 同注释39, 182页。

49) 同上, 483页。

50) 同上, 485页。

51) 同上, 511页。

性、正‘人’(仁)、正‘鬼’、正‘毁’之根本名义的基础上,以对道理之‘名’作本质定义的方法达到树立儒家伦理权威的目的。但是如上文所解析的那样,受传统正名思想对思维方式的影响,韩愈的‘正名’在逻辑上也比较简单,缺少对研究对象的详细辨析,原文文中有大量间接论证的运用,使这种文体形成了一种‘不辩之辩’的特殊论证风格,比如〈原道〉全文主要着墨于阐述儒道之内涵,先树立一个绝高的‘儒道’,然后使佛老不攻自破,这种方法和一般论体文强调的条分缕析、辩证群言多有不同,很多时候经不起细致推敲。再比如〈原鬼〉,五篇文章中它的篇幅较短,但在逻辑结构上却可以清楚的看到前后相违背的地方,文章的开始给人韩愈试图从“无形”与“无声”的角度论证世间无“鬼”之感,但即使鬼“无形”、“无声”,韩愈依然秉持“无声与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的观点认为鬼神是存在的,整篇文章定义上的虚无与“有动于民而为祸,亦有动于民而为福”这样功能上的实存构成了相悖的论点,可以看出韩愈的文章有时存在为了立论而忽略实证逻辑严密性的问题。朱熹与门人谈论时,曾多次发表过对韩愈文章不够精密的看法,“如原道中说得仁义道德煞好,但是他不去践履玩味,故见得精微细密。”⁵²⁾在受到儒家正名思想对概念的模糊性和不精确性的思维方式,尤其是孔子的深刻影响下,如蒋凡所说的那样:“韩愈不是一个理论家,因此,他的所谓‘道’缺乏精深博大的理论思辨色彩,有时还有点迂腐庸俗之味,这是人所共知的。”⁵³⁾

IV. 结语

综上所述,从文体角度看原文作为一种独特的论说文体,是由于韩愈的创新而兴起的论说思维方式,通过超越传统论说文的体式范式追本溯源,为中唐以后儒家观点的坚守本位和反思重建提供了新的论证思路,在佛道盛

52) 同注释36, 2507页。

53) 蒋凡,〈韩愈‘原道’篇新证〉,《学术月刊》,1985, 56页。

行的思想洪流的裹挟中，原本文开启了儒家伦理本体化的趋向，为儒家各学派争取正统地位提供了新颖的话语表达方式。原本文丰富了中国古代论说文的体系，无论是从逻辑结构、文体形式还是从思想内容上看，都能看到韩愈在原本文中对于正名思想有着深刻理解并且能够将其进行新变运用来展示自己的论辩技巧。

本文在继承前人韩愈的原本文运用了正名思想以揭示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差异的基础上，选择以同样‘溯源’的方式对原本文进行了更加多方位的考证。比如本文从文体的角度出发，由‘原’字的本义内涵谈起，考证了原本文的由来，顺势揭示了原本文虽自韩愈开始盛行，却不是由韩愈首创的事实，韩愈的贡献在于将原本文的写作方式系统化，在赋予其强烈的思想性与儒家教化意义的同时，显示出有别于传统论说文的独特气势与特征，故以往单纯地认为韩愈创造了原本文的说法则还是有待商榷。文章还利用了同样的溯源的方式从儒家学者中孔子首倡正名谈起，以‘乡愿’为例，结合韩愈时代的社会现状，探究韩愈利用正名思想树立观点的论证源头，揭示了正名思想对于在韩愈树立儒家道德内涵时发挥的重要作用。还通过对‘名’的本义内涵的深层追溯认识到韩愈利用正名思想明确概念认知的必要性，并且可以认识到韩愈不仅在文学上主张复古先秦时期的文章，在思想上也有传承的事实。

本文的创新点还在于，历时分析了前人未曾涉及到原本文文体在中晚唐以及宋元之际的创作情况，尤其是发现了鲜少有人言及的晚唐时期皮日休继承韩愈之志而作的十篇原本文，详细记叙了原本文作为一种文体的传播拓展过程，强化了其在今后世儒学思想论争中产生过实际文学价值的认知。并且查证了后世对韩愈在原本文的创作中展现出来的独特的写作技巧和文学特色的点评，得到了原本文与一般论论文相比展现出了不同的文学魅力，借助科举竞相得到宋代以后文人效仿的事实。

然而不得不说，通过‘溯源’的方式对韩愈的正名思想接受考察过程中，明确了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他的原本文是以伦理教化为目的，因此它的辩论并不完全是是非对错的反映，尽管韩愈试图通过正名思想明确儒家概念的内涵，但其给概念下定义的时候受到深刻的先秦思维方式的影响，在哲学逻辑

的论证上存在一定的自发性与模糊性,例如,〈原性〉中对‘上品之性’与‘下品之性’的区分缺乏严格的逻辑推演,〈原道〉中对佛老的批判主要集中于其‘清静无为’对社会秩序的消极影响,但未能深入辨析佛老思想的内在逻辑,因此韩愈的批判虽具有现实针对性,也缺乏对其它学派的全面理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后人如朱熹的诟病,“他于外面皮壳子上都见得,安排位次是恁地。于原道中所谓‘寒而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为宫室,为城郭’等,皆说得好。只是不曾向里面省察,不曾就身上细密做功夫。只从粗处去,不见得原头来处。”⁵⁴⁾

韩愈的原本文继承了自孔子之后各位先儒的正名思想的传统,同时又赋予了其时代意义,并为后世理学家们的理论建构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论证手段。在内容上,本篇文章是在前人提出的韩愈受正名思想影响颇深的共同认知下完成,有相似观点出现并非本意,尽管在此基础上已经尽量从新的角度进行论证,少不得有不足的地方。并且由于受本篇文章选择的角度所限,并没有过多的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分析探讨韩愈原本文的论证结构、修辞手法与表达之间的互动,在思想内涵的解读方面有的地方不够深入,关于韩愈的原本文还有很丰富的研究空间,未来的研究应从多学科视角出发,深入挖掘其文体、思想与历史意义,以便更加深切的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参考文献〉

- 程志华,〈中国哲学‘原人’问题的学术史考察〉,《光明日报》,2022。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册(影印本),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
 冯友兰,〈韩愈李翱在中国哲学史中之地位〉,《清华周刊》,37卷 9-10期,1932。
 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

54) 同注释36, 2515页。

- 出版社, 2014.
- 胡适, 《先秦名学史》,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83.
- 贾瑞芬, 〈韩愈尊儒思想探微——以‘五原’为例〉,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9.
- 蒋凡, 〈韩愈‘原道’篇新证〉, 《学术月刊》, 1985.
- 李翱, 《李文公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 吕祖谦, 《古文关键》,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 黎靖德 编, 《朱子语类》第八册, 北京: 中华书局, 2020.
- 刘宝楠 撰, 高流水 点校, 《论语正义》,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 刘成国, 〈文以明道: 韩愈‘原道’的经典化历程〉, 《文史哲》 第3期, 2019.
- 刘宁, 〈韩愈‘五原’文体创新的思想意涵〉, 《安徽大学学报》 第四期, 2018.
- 刘真伦, 〈‘五’原的创作与道统的确立——兼论韩愈阳山之贬与文风之变〉,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 2006.
- 潘培鸿·张佩, 〈‘五原’中的破与立——论韩愈的护‘道’逻辑〉, 《名作欣赏》, 2015.
- 皮日休著, 萧涤非·郑庆笃整理, 《皮子文藪》,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邵强进, 〈论先秦正名思想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 《江海学刊》, 2004.
- 石介 著, 陈植锷 点校, 《徂徕石先生文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宋祁 等 撰, 《新唐书》,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苏舆 撰, 钟哲点校, 《春秋繁露义证》,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 王琯, 《公孙龙子悬解》,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 温公颐, 《先秦逻辑史》,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 吴承学,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1.
- 吴讷·徐师曾, 《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 谢枋得, 《叠山先生批点文章轨范》中华再造善本,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

张冬冬·高明雪, 〈韩愈‘五原’思想旨归论辩〉, 《商洛学院学报》, 2012.

张清华, 〈韩愈的道、道统及‘五原’的写作时间辨析〉, 《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5.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Han Yu's "Five Originals" series embodies and applies the pre-Qin Confucian concept of "rectification of names." As a central figure in the Mid-Tang Classical Prose Movement, Han Yu sought to reconstruct Confucian moral order by tracing the philosophical "origins" of ethical and political categories, while countering Buddhist and Daoist influences.

The essence of "original-style prose" lies in its pursuit of fundamental principles through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Han Yu employed logical methods of classific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 as seen in his "Three Grades of Human Nature" in Yuan Xing and his definition of the Confucian Way through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in Yuan Dao – to establish conceptual clarity and normative unity, realizing the Confucian ideal of "rectifying names to rectify governance." His style synthesized the precision of pre-Qin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with the elegance of classical prose, transforming linguistic rectification into an act of moral reconstruction.

The influence of this genre proved enduring. Northern Song scholars like Shi Jie and Ouyang Xiu revered his works, while Southern Song Neo-Confucians like Zhu Xi incorporated them into the orthodox "transmission of the Way." Through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the argumentative mode of original-style prose became a model for literati rhetorical training, shaping subsequent academic writing.

In conclusion, Han Yu's original-style prose provided both linguistic methodology and moral philosophical framework for the Confucian revival, bridging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while anticip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ng-Ming Neo-Confucianism, thus establishing itself as a mileston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rose and intellectual thought.

Key Words : 韩愈(Han Yu), 原本文(original-style prose; yuan ti wen),
原道(Yuan Dao), 正名思想(rectification of names; zheng ming), 逻辑Confucian; logic)